

从2011年开始,齐鲁晚报启动“凡人歌·山东十大凡人善举”评选活动,至今已有七年。七年来,“凡人歌”推出700多个感动世人的真情故事,其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提升,成为媒体中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著名品牌。新近出版的《凡人歌:山东人的年度精神史诗》一书对这些凡人善举的感人故事进行整理与回望,使读者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、社会大爱。如同作家刘玉堂所言,《凡人歌》将山东人的精神清香留住了。

【名家序言】

□刘玉堂

《凡人歌》,我定义为“人物通讯集”,所述内容的真实性,无可置疑!该书最能打动我的也是这一点。

近年,我很少读或看小说及影视之类的东西了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在于它们的不真实。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艺术,没有生活;只有技术,没有情绪;只有特技,没有故事;只有惊愕,没有感动;只有视觉冲击,没有心灵震撼了,真的是怎一个假字了得!以一种心存疑虑或半信半疑的心态去读作品或看影视,哪还有美感或快感可言?崇真尚善是人的天性,所谓真、善、美,真永远是第一位的,首先你得真呀!《凡人歌》就正契合了我阅读的习惯和兴趣。传统报道与网络文字双管齐下,没有半点的粉饰或拔高,完全用场景和情景说话,用的又是拉呱或讲故事的语言,你怎能有半点的怀疑?剩下的就只有感动与钦佩了。

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。《凡人歌》的切入点甚好!积我与《齐鲁晚报》交往三十多年之经验,深感该报一



《凡人歌:山东人的年度精神史诗》
葛亮 李师胜 主编
山东画报出版社

茬一茬的新老编辑,点子多多,创意频频,特别能创新,也特别接地气,经常会与时俱进地推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、心中一热的好栏目、好活动。晚报创刊一万期的时候,我曾撰文称赞了这一点。三十年间,我有幸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或征文,像他们在《凡人歌》栏目的基础上,从2012年开始,连续五年主办了凡人歌·山东十大凡人善举评选和颁奖的活动,有一届我也应邀参加了评选。

“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,题目很大,怎么破

题或从哪里切入?哎,他们就开了个“凡人歌”的栏目,以寻常人不凡事为主线,扎根基层,发掘优秀典型,展现山东人乐观向上、重信重义、开拓创新等精神品质,既切题,又好操作。从2011年初至今的7年间,该栏目每年都刊发稿件百篇以上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,“凡人歌”也成长为名栏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舰品牌,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他们欲将其打造成“山东人的年度精神史诗”,也指日可待。史诗或诗史,有两个标志性特点:一是英雄人物,二是重大事件。而这两个因素《凡人歌》都具备。和平时期,一些人命关天的突发性事件,诸如自然灾害之类,我看也可以称之为重大事件的。

我们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基因,其中就有崇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讲辩证,尚和合、求大同;也有自强不息,敬业乐群、扶正扬善、扶危济困,见义勇为、孝老爱亲等等。我们看到该书所报道和称颂的凡人善举,或英雄壮举,都是源自我们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自然反应或下意识

的举动,没有一个是动着脑子或心思去做善举或壮举的。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,没有半点的患得患失,你觉得这就是或这才是咱们山东人!

有一个叫科顿·马瑟的人说:如果有人问,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做好事或善事?我的回答是,这个问题就不像是好提的。

危急关头,想好了如何回答而后再行动的人,一般都是绕道而行,为冷漠找借口的人。

还是说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小故事:一个小男孩在退潮后的沙滩上跑来跑去,把困在沙坑里的小鱼扔到海里。有人问他,你做的这些谁在乎?他说这一条在乎,还有一条也在乎。

如同将困在沙坑里的孩童一样,该书的主人公们都很平凡、很普通,但却站在我们心灵的制高点上。他们是阳光,荡涤着社会良知久滞的积垢,也警醒着人们近乎麻木的魂灵。

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香满乾坤。无论如何,《凡人歌》是将山东人的精神清香留住了。它是一部渗透着和散发着清香的书,故而我愿意格外地称赞它、推荐它!

【编辑推荐】

《民国来了》

杨早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作者强调回到历史现场,以诸多具体的人物入手,重现辛亥人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的辛亥革命,呈现革命与日常的“有关”与“无关”。辛亥的历史舞台,登场的不仅有斗法的孙中山、袁世凯,也有满族权贵端方、士绅代表张謇,更有学童沈从文、少年叶圣陶、热血青年蒋介石、师范校长鲁迅……

《使女的故事》

[加拿大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描写的是未来之事,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。奥芙·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,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,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,帮助他们生育子嗣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,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、经济危机等问题,还陷入了相互敌视、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。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,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。

《天黑得很慢》

周大新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采用拟纪实的手法,用讲故事的方式,关注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,有关爱与恨、病与死,既有人们在时间无情面前的绝望,又有人们用以抵御时间的坚韧、温暖和爱。

《做书的日子》

李昕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出版家李昕的个人回忆录,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4年、香港三联8年、北京三联9年工作经历为线索,分享30多年(1982—2014)编辑之路的酸甜苦辣,讲述出版背后的精彩故事,描摹出近30年的中国出版史。

《50:伟大的短篇小说们》

果麦 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用咫尺篇幅来浓缩人生经验的种种方面,对剪裁技艺的考验不言而喻,所以经常被有经验的作家推荐出来做小说创作学习的范本。本书收录世界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50篇,犹如50颗璀璨夺目的明珠,大师们独到的叙事风格和技巧,展现了短篇小说的多重魅力。

《济南往事》

魏新 陈忠 著

杨鹤 图

本书记录了作者对济南这座城市私人化的、碎片式的、断桥式的真实记忆,城市的时代变迁中融合了市井的烟火、街巷的温情,是生命形态的回放,也是对济南的热爱、对城市文化的深深向往和眷恋。



【书摘】

游民帮会

□王学泰



《写在历史的边上》
王学泰 著
东方出版社

五代十国时期,政治中心在汴京(今开封),洛阳是西京。这里生活安逸,是很多退休的富贵大佬钟爱的地方。周世宗柴荣的父亲柴守礼也住在这里。儿子已经做了皇帝,身为皇父的柴守礼,还能有什么不满足吗?可是也有怪事,他在西京洛阳胡作非为,而且与当时宰相、将军如王溥、王宴、王彦超、韩令坤等人住在洛阳的老爸,朝夕聚合,往来密切,结成团伙,人称“十阿父”。柴守礼竟敢在市上杀人,暴戾恣睢,洛阳人畏之如虎。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还算个英明的皇帝,对自己痞子老爸和那一帮为老不尊的权贵也无可奈何。

一般的组织犯罪大约是无代无之,而且是越来越严重,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增加,为结伙提供了方便,但从“结伙”发展为黑社会,是明清以来的事情。因为黑社会犯罪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的结社,中国民间非宗教目的的结社发生于宋代市民和游民之间。市民结社多与个人爱好有关,结合在一起招集同道、切磋技艺。比如爱蹴鞠(踢球)就有齐云社,弄杂剧就有绯绿社,喜欢相扑(摔跤)就有角抵社。而江湖人(游民与社会边缘人组成)搞违法犯罪活动或所谓“干大事”也要结社。从北宋活跃起来“桃园三结义”的风气和晁盖等人的“七星聚义”,按照一定分工去作案。这些还是原始的,结构简单的结社,除了以义气为纽带外,很少有其他规范。但自从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以后,

为游民的组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的范本。一些立意要与主流社会对抗、或由于各种原因被逼无奈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把“梁山”(此时已经成为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符号)看成他们躲避风险和实现自己向往的圣地,也成为造反者的一面旗帜。到了明代,因为搞了分封制度,使得藩王占据了大量土地,明中叶人口激增,大量被土地抛离出来的宗法农民,成为游民。游民一无所有,他们要向社会索取合法或不合法的利益,个体是没有能力的,要生存发展就要组织起来。江湖型的游民帮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。

游民组织的灵感大多来自通俗文艺作品,特别是《水浒传》。这一点,我们从组织的名目上也可以看出来。例如“三十六天罡”、“七十二地煞”、“天罡党”、“十三太保”(来自《哭存孝》、《存孝打虎》)等名目都有十分浓重的小说色彩。其组织系统、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的统一,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仪轨也大多借鉴通俗文学。比较典型的就是天地会(洪门)。它的入门诗开头两句就是:“桃园结义三炷香,有情有义是宋江。”这就涉及两部通俗小说。他们设计的人格表率就是宋江,头领都以宋大哥自居。其组织形式也多取自梁山。其誓言就是: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

天地会最初的建立与明朝灭亡有关,它曾是有政治理想的(反清复明),特别是其领导与核心分子。后来政治理想逐渐淡出,它蜕变成为只做文

差事(诈骗做局)和武差事(抢劫)的犯罪组织,逐渐堕落为黑社会。然而各地区又有差别,坚持最初建会原则的不能说没有,但少之又少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与其会众构成有关。其成员主要是游民,连饭都没的吃,还搞什么“反清复明”?天地会种种规则、规范,成为后来帮会和黑社会的行为示范。

随着游民泛滥和社会动乱,天地会组织不仅扩大到南半个中国,还流传海外,并多有异名,如:三合会、三点会、洪门、添弟会等,海外的或称“公司”。清中叶以后,活跃在江苏、上海的红帮,四川、云贵一带的哥老会、袍哥都是其变种。比较独特的是青帮,它是在原有漕运(从大运河由江浙往北京运粮)工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,而且崇拜罗教(秘密宗教的一种),帮内辈分极严(天地会内则兄弟相称,而且“哥不大,弟不小”)。北方则有在理会,崇拜白莲教。因为青、红、白(在理会)活动地域不同,冲突不大,还能说“白藕青叶红莲花 三教原来是一家”。帮会在清代处于秘密状态,辛亥革命之后,过高地评价了帮会在革命中的作用,胜利后则帮会活动公开化。民国期间,政府长期处在弱势状态,帮会遂成为“二政府”,黑白不分,政出多门使民众无所适从。有的帮会甚至发展为“全民性”的,如四川哥老会,上起豪门权贵、社会贤达,下至贩夫走卒,无不“海袍哥”,这几乎成为一种传统。

(原文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